

未来,关于巴黎圣母院的三种可能

演讲 王海松 整理 本报记者 徐蓓

不久前,巴黎圣母院发生重大火灾,这座被维克多·雨果喻为“石头的交响乐”的世界文化遗产严重受损,让世人心痛不已。巴黎圣母院曾经有过怎样的辉煌?未来的巴黎圣母院又将如何修缮?请听来自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王海松教授在宝山行知读书会上所做的演讲。

巴黎圣母院的“前世”

巴黎圣母院的英文是 Notre dame,意思是“我们的女士”,这位女士就是指圣母玛丽亚。巴黎圣母院距今有 800 多年的历史,它的形象已经深深烙在全世界人民的心中。巴黎圣母院是法国早期哥特式教堂的代表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巴黎历史悠久、最具代表性的古迹。在它之前,教堂建筑大多厚重、低矮,沉重的拱顶、厚实的墙壁、阴暗的空间,使人感到压抑。巴黎圣母院冲破了旧的束缚,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轻巧的骨架券,这种结构使拱顶变轻了,空间升高了,光线充足了。这种独特的建筑风格很快在欧洲传播开来。

巴黎圣母院的正立面朝西,其背面是东面,整个主立面被壁柱、装饰带分割成 8 个矩形单元,且均呈黄金比例分割,看上去和谐、匀称,是世界上最美妙迷人的哥特式建筑。它的侧面和正面是不一样的——正面庄重、对称,不像一般哥特式建筑那么“轻飘飘”,侧面看上去则非常灵动。它的造型既空灵轻巧,又符合变化与统一,其比例与尺度、节奏与韵律符合建筑美学法则,具有很强的美感。

我们现今所看到的巴黎圣母院,历史上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 1163 年,终于 1345 年。1163 年,巴黎圣母院奠基,早期的巴黎圣母院,不是一开始就有完整的规划,而是在建设中不断扩展、完善,最早建造的是祭坛,随后是中殿和十字耳堂西侧。西立面是在公元 1200 年建成的,后部的尖塔直到 1245 年才完工。十字形耳堂的北立面约完成于 1250 年,南立面在 8 年后动工建造。整个建筑的建造,持续了近两个世纪,最终于 1345 年完成。

第二阶段是 16-18 世纪。当时,由于基督新教胡格派派乱和法国大革命,巴黎圣母院在一段时期内曾遭到较严重的破坏。法国大革命的目标是要“平民化”,所以圣母院被改作“理性神殿”,并一度用作藏酒仓库,甚至有人在里面养过猪,所有中世纪风格的彩色玻璃都被换成了白玻璃。

第三阶段在 19 世纪时。1802 年,拿破仑又重新赋予了巴黎圣母院宗教之职,巴黎圣母院重新进行了修缮。1831 年,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出版小说《巴黎圣母院》,唤醒了民众对这座历史建筑的保护意识。人们发起募捐来拯救圣母院。1842 年,巴黎圣母院修缮工程的竞标结果公布,由让·拉苏斯和维欧勒·勒·杜克主持修复工作。这两位法国建筑师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修复了巴黎圣母院。现在我们看到的巴黎圣母院,其主要的形态和细节,都是在 19 世纪重修期间完成的。

历史建筑修复的两大流派

巴黎圣母院发生重大火灾之后,如何修缮成为一个重要话题。世界上有很多建筑都曾遭遇毁灭、重建,这对建筑师、文化学者以及社会公众来说都是一个考验。

目前,国际上对于修复历史建筑有很多不同的思维、方法,学界的态度也并不统一。今天我主要介绍一下其中的两大流派。

主张照原样维护古建筑的“历史保真派”,以两位英国建筑师约翰·罗斯金和威廉·莫里斯为代表。约翰·罗斯金所著的《建筑的七盏明灯》,是在历史建筑保护领域被奉为神典的一本书。设计师威廉·莫里斯则于 1877 年创立了“古建筑保护协会”(The Society of the Protection of Ancient Buildings),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关于历史建筑保护的建筑师组织,这



两位都是被载入史册的建筑师。该流派强调历史建筑本身的年代价值和历史痕迹,反对对风格统一而修复,认为修复不应定格在特定风格,而应建立在对存量评估的基础之上,模仿历史风格会造成古迹真实性的丧失,新旧应有区别。有时,坚持该理论的建筑师甚至拒绝去修复一座古建筑,宁愿用“保护”去代替“修复”,用“维护”来保持建筑的可用性,并拒绝新技艺的介入。

另外一个流派是所谓的“风格修复派”,他们强调“修,但允许适度创新”。1844 年重修巴黎圣母院的建筑师维欧勒·勒·杜克,就是“风格修复派”的代表人物,他主张从原建筑师的构思出发,用类似的手法进行完善,甚至是再创作。他提出不应抱残守缺,而要有创造性地进行修复,以重现历史建筑原初的精神风貌。1345 年完工的巴黎圣母院,尖塔并不是后来的样子,而是维欧勒·勒·杜克根据巴黎圣母院的造型重新进行了设计,他把尖塔提高了 13 米,达到 90 米的高度。落成之后,建筑界包括史学界都对他的重修一致肯定,觉得他修得很好,觉得这对巴黎圣母院提升很大。适度创新,也可以修出很好的效果。

1842 年,在巴黎圣母院修缮工程中标之后,维欧勒·勒·杜克和让·拉苏斯于 1844 年至 1864 年间大刀阔斧地对巴黎圣母院展开了修缮工作:修复立面、拱座和飞扶壁,立面石材被大量替换;修复了君王走廊的群雕、正门、滴水嘴、顶端花饰、怪物雕塑和小尖塔;修复了屋顶和铅皮覆盖的屋脊装饰,中部尖塔和南北塔楼的钟楼;恢复了中世纪式样的彩色玻璃窗、湿画法的壁画、1403 年的管风琴、1730 年的管风琴箱以及所有的家具;重建了圣器收藏室和长老会堂;为圣母院加盖了 90 米高、雕镂着精美花饰的尖塔。

我好几次去巴黎圣母院,都会留意这样一个细节:在南北墙面上,有很多伸出来的兽头,它们形态各异,并在下雨时吐水柱,原来这正是维欧勒·勒·杜克设计的神来之笔——这些漂亮的怪兽其实是屋面雨水的出水口,它们虽然不是教堂墙面上原有的,但现在看起来,它们已经和巴黎圣母院融为一体。

维欧勒·勒·杜克既是一位建筑师,也是一位理论家。他认为,要通过缜密的考证和推理,对古建筑进行创造性修复,以实现与中世纪伟大工匠跨时空的对话,这在当时也是一种创举。20 世纪初以来,建筑界有关历史建筑保护的各种宪章层出不穷,对文物保护的原则也做出了种种界定。比如 1931 年的《雅典宪章》及 1933 年的《城市规划大纲》都提到,发展的过程

中应该保留古迹以及历史建筑,并应尊重其特征、风格。二战后出现的《威尼斯宪章》则是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原则,宪章肯定了历史文物建筑的重要价值和作用,将其视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和历史的见证。《威尼斯宪章》又称为《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它强调修复是一种高度专门化的技术,必须尊重原始资料和确凿的文献,决不能有丝毫臆测。对于古迹修复,它强调最小干预、原真性、整体性,还有可逆性。也就是说,“补足的部分应跟原来部分明显区别,以防止补足部分使原有的艺术和历史见证失去真实性”。此外,还有《佛罗伦萨宪章》《世界遗产公约》等,这些宪章和文件的出台,使人们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视野越来越宽阔。

未来巴黎圣母院的三种可能

对于未来巴黎圣母院的重修方案,无非有以下三种可能:一、不修,保留残缺。二、修,照原样复原。三、修,并且允许适度创新。

到底是哪一种可能性更大呢?我在学校的课堂上,和同学们就这件事展开了讨论。结果,近一半的学生主张将巴黎圣母院按原样修复;剩下的同学又一分为二,一部分主张不修,维持现状,另一部分主张重新设计巴黎圣母院被大火摧毁的部分。

支持第一种方案的学生认为,虽然现代修复技术有能力复原巴黎圣母院,但历史建筑有灵魂,做假品没意义。支持第二种方案的学生认为,对于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古建筑,一旦变了模样,就不再是人们心目中的那座建筑。支持第三种方案的学生则认为,历史建筑其实都是经过几百年、上千年的不断翻建、扩建、修复而来的,巴黎圣母院 19 世纪重修时,也并未完全依照 14 世纪的模样,也就是说,建筑在使用过程中就是不断“生长”的,可以允许适度创新。

还有人提出,应该维持原样,但可以对内部的防火性能进行提升,为此使用一些钢结构和新型材料也未尝不可;更有人大胆提出,就像贝聿铭在罗浮宫前建造了一座玻璃金字塔,那样不也很棒吗?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建议。

不久,媒体报道法国将针对巴黎圣母院的修缮展开国际竞赛,遴选合适的设计方案和建筑师。顿时,全世界的建筑师都跃跃欲试,网络上各种奇思妙想令人目不暇接。

我收集了一些建筑师对于巴黎圣母院的改造设想。

曾经设计香港汇丰总部大楼、德国议会大厦玻璃穹顶的英国著名建筑师诺曼·福斯特,把原来的木构铁皮瓦设计成玻璃屋顶,还带一个观光平台;巴西圣保罗的设计师也提出用彩色玻璃恢复屋顶;俄罗斯设计师的方案,是将传统砖尖塔和玻璃穹顶相结合;一位景观建筑师说,巴黎圣母院原来的屋顶建造时用了一片森林的木材,现在不妨在屋顶上设计一片森林来体现;一位法国建筑师则设计了一种特殊的方式,记录下巴黎圣母院着火的瞬间,并把把这个瞬间作为巴黎圣母院的一部分,永远载入史册。

就我个人观点而言,我认为,对于巴黎圣母院这样的古建筑,还是应该恢复原状,而不要轻易使用创作代替修复。因为不同的文化遗产建筑有各自不同的价值,我认为巴黎圣母院作为世界文化的瑰宝、法国文明的骄傲,它的形象已经根植于民众脑海之中,所以它必须被延续下去;当然,现代科技的发展,让建筑师、艺术家们有更多的可能性去实现他们的想法,因此,古老圣母院的修复不应该排斥合理技术的使用。

对巴黎圣母院来说,它的未来掌握在专家手中,也掌握在对历史建筑修复有清醒认识的民众手中。让我们拭目以待。

演讲

父亲到底给了我什么

曹景行

媒体人曹景行曾在“拙见”发表了题为《爸爸和家》的演讲。今天,谨以此文献给天下所有的父亲,愿每一位父亲都能成为照亮孩子成长道路的灯塔。

说到父亲,其实我和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日子实在是太少了。

按照今天的说法,我是一个留守儿童,我的父亲曹聚仁因为工作需要,常年在外打工,母亲带着哥哥、姐姐和我一起生活。父亲离开上海去香港的那一年,我只有 3 岁。最后,当我见到我父亲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1972 年的一天,我们突然接到电报,说他病危,等我到从广州赶到澳门拱北关口,还是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父亲这一辈子没见过我的妻子,更没见过他的孙女,我甚至没来得及在父亲节里问候他一声。

但是,在我的一生中,父亲究竟给了我什么?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的脑海里。今天,我试图来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和很多的家庭一样,父亲是我们家真正的顶梁柱。他和我妈妈一起撑起了这个家,为我们挡风遮雨。当初他为什么去香港工作?虽然有很多说法,但是他在给家里的信中写得很清楚,就是为了养活这个家。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要过日子,所以他去香港工作,这个工作就是写字。

后来我见到李敖先生,他对我说:这辈子就是你爸比我过得好。因为我父亲一生中发表了 4000 万字的作品,连李敖这么多的作家也没写到 4000 万字。我父亲曾经在文章里提到,这种写稿的日子叫“手停口停”,一天不写东西,就没有吃的了。为了整个家庭的生活,他必须一直写。

他 1972 年去世前的最后一张照片,是病危时在医院的病床上拍摄的。当时他人已经坐不起来,瘦得不像样子,他就拿一块板,手举着在写稿子,因为报纸上的专栏还在等他的文字。这张照片我看了非常心疼。

虽然他和相处的时间非常短暂,但他始终关心我的成长。记得我 9 岁那年,跟着母亲去北京看望父亲,那是他离开上海去香港 6 年之后第一次到北京,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为了两岸沟通的事情而来。我和妈妈的到北京的时候天很热,我们去了父亲的饭店,看见我满头大汗,父亲就来帮我洗澡。洗澡的时候他突然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直到今天还记得非常清楚。我的名字叫“闲闲”,他说:“闲闲怎么这么瘦啊?”

当得知我后来去下乡种地时,父亲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闲闲,归农正是我们的心愿。不过新农业得学习很多,改良种子,化学肥料,改良土壤都是要事。这就得跨到老农,一步步来。”他说我们家以前就是农民出身,鼓励我要做一个新农民。

其次,父亲留给我一个读书的环境。家里全是书,而且我们家里人全都爱读书。所以,我也从小爱读书。我记得 9 岁生日的时候,父亲在北京给我买了《水浒传》。因为我小学一年级时就读了《水浒传》,所以小学二年级开始读《水浒传》,接着是《说岳全传》。

在这种环境中,读书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我可以不吃不喝,但是我不能不读书。直到后来我做新闻评论工作,还得感谢读书给我带来的广阔视野。

再有,父亲教会我要有大的格局。因为父亲的存在,从小看着大人做大事,谈大事,所以我关注的事情比较多。父亲让我感觉到,要关心世界上的大事,不要只纠缠在小事上,凡事要看得长远一些。

父亲的一生,始终有一种使命感。波兰作家亨里克·显克微支有个短篇小说叫《灯塔看守人》,父亲常把自己比作那个看灯塔的孤零零的老人。抗战期间,他辞去大学的教职,脱下长衫,走出书斋,带笔从戎,随军进退,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源源不断地为报刊撰写战地通讯。他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海水悠悠难化酒,书生有笔日如刀。战地碧血成虹影,生命由来付笑谈。”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他真的什么都不顾。他的这样一种精神,对我的终身影响很大。

最后,父亲还以他的方式,教会了我怎样做人。我和父亲几乎没有在一起生活,他的为人、他的许多事情,我都是通过别人告诉我的。我刚刚进复旦大学的时候,有一天,一个同班同学突然对我说,他的爸爸向我和我妈妈表示问候。原来,他爸爸当年抗战时从上海经过江西要去内地,在赣南逃难的时候,我父亲接待了他,还让他住下来,并且帮他找了工作。所以,他父亲通过他的儿子来向我们表示感谢。

这样的事例有很多,我后来在香港工作,也经常听到有人由衷感谢我的父亲。父亲帮过的人实在太多,只要能够帮,甚至自己吃亏,他也会去帮助别人。父亲还说过,只要是朋友托付的事情,一定要把它做好。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话外音



“要多边主义,不要单边主义,要有全球化思维而非单一国家思维,要思想开放而不要做孤立主义者。保护主义和贸易冲突会危害自由的国际贸易,继而损害当今繁荣的根基。单打独斗是无法取得众多成就的,我希望你们拆掉无知和思维狭隘的墙,要为了多边和全球化的世界利益而共同行动。”

——日前,德国总理默克尔作为嘉宾出席了 2019 年哈佛大学第 368 届毕业典礼,并发表演讲。她在演讲中这样劝告大学生们。



“我国历来重视儿童问题,但落到实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比如法律层面,在国外,家长体罚孩子、离开孩子两个小时(孩子处于无人监管状态)可能都属于违法行为。而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里很多属于原则性问题,可操作性还不够。在观念上,我们也很少把孩子当作有独立人格的个体,儿童很少参与社会、学校的决策。”

——在中国儿童发展论坛新闻发布会上,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这样表示。



“工业革命的下一个兴替很快将要到来,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蒸汽机时代,始于 18 世纪 60 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电气时代,始于 19 世纪 60 年代;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信息时代,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接下来人类将迎来第四次工业革命,预计在 2030 年左右迎来智能时代。”

——在 2019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长高文在主旨演讲中这样说。



“一个人的道路总有走完的一日,但作为中华文化之珍贵宝藏的诗词之道,则正有待于继承者的不断开发和拓展。至于我自己则只不过是这条道路上,曾经辛勤劳动过的一个渺小的工作者而已。”

——近日,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叶嘉莹再次向南开大学捐赠 1711 万元。去年,叶嘉莹先生捐赠 1857 万元积蓄给南开大学,设立“迦陵基金”。加上此次捐款,目前她已累计捐赠 3568 万元。95 岁的叶嘉莹先生曾经这样自述。



“不跟外国人跑,走自己的创新之路!”——几十年前,“中国稀土之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徐光宪顶住质疑、顶住压力,下定决心坚持走创新之路的这句话,至今仍掷地有声、振聋发聩。

(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

讲座

名校校长对话:大学需要什么样的学生

近日,在“石室论剑”对话名校校长活动中,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林忠钦、四川大学校长李言荣、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徐飞、重庆大学校长张宗益、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刘清友齐聚一堂,共话“如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问题一:什么是拔尖创新人才

徐飞:拔尖创新人才具有以下几点:第一是责任担当,第二是创新人格,第三是想象力,第四是好奇心,第五是批判性思维。没有大我,只专注于小我,格局不高,注定是走不久、走不远的,所以我把责任担当放在了第一位。关于创新人格,我更看重的是意志力、抗挫力,遇到事情能够坚韧不拔,决不轻言失败。

李言荣:什么是拔尖人才?就是你能做 0 到 1 的事情,而不仅是 1 到 2,2 到 3 的事情,那就需要创新。时代需要“领跑者”,我眼中的拔尖型人才,需要具备以下五个能力:一是大胆猜测、大胆想象的能力,二是思维的表达能力,三是深度学习的能力,四是专注能力,五是创新知识整合能力。

林忠钦:拔尖创新人才包括学习和品格两个方面。学习方面:1、首先要勤奋好学。2、学习过程中要有刨根究底的精神,这是很多科学家身上共性的特点。3、做事情要非常认真。品格方面:1、首先要有责任心。2、要有感恩之心。不要理所当然地认为别人对你的帮助是应该的。3、心里要阳光。对待人、对待事情都要从好的方面着想,不要总想着不好的一面,这样才会有健全的人格。

张宗益:1、一定要有热情。只有有热情的人,才拥有创新的底蕴,才拥有拔尖的基础。拔尖就是独树一帜,创新就是做别人不做的事情,具有颠覆性、引领性、原创性。要干这样的事,一定要有热情。2、要有理想和抱负。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要有正确的价值观。3、敢质疑。不仅要敢质疑,而且要有理性地质疑。4、敢表达。有底气,才有勇气去表达。5、坚持。如果你不能坚持的话,要想成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刘清友:首先要做人做事做好,拔尖创新人才才有可能成功。具体来说有几点:1、健康生活很重要。要把体育锻炼变成一种生活习惯,做任何事情的基础,都要有一副好的身板,成为拔尖创新人才更是如此。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家庭、对自己。2、具备人文素养。一个拔尖人才如果没有宽阔的知识面,不懂政治、不懂历史,我

觉得很难长久。3、要有科学的精神和态度,同时还要有“坐得板凳十年冷”的科研精神。4、要有科学担当。5、要有创新意识。

问题二:大学需要什么样的学生

李言荣:学校是一个“放大器”,要经过若干次“放大”,你的人生才会不断“放大”,你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拔尖创新人才。在人生不同的教育阶段中,幼儿园锻炼了我们的独立生活能力,中小学锻炼了我们的独立思考的能力,而大学则锻炼了我们的研究能力,研究能力是创新的土壤。

徐飞:从一个校长的角度,我给大家两个忠告。一是要听话,二是要不听话。为什么听话呢?因为现在的社会是规则社会,是法治社会,你们要遵守规则,这是一个公民最起码的素养。不听话就是要敢于颠覆和反叛。“听话”和“不听话”没有固定的标准,需要自己去摸索体会。

林忠钦:我们大学需要的学生是这样的:一是不甘落后,始终坚持、一直努力的学生,二是能经常自省的学生,三是能够充分利用时间的学生。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一定能做出不平凡的成绩。

(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

(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